

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与 清朝西北边疆形势*

齐 光

阿拉善和硕特部是卫拉特蒙古诸部中最早服属清朝的一支。因其与青海和硕特部同为固始汗嫡系子孙，且深知准噶尔部的内部情况，又与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结有深厚关系，故其服属过程纷繁复杂，前后长达 20 余年。本文注重阿拉善和硕特部与青海和硕特部、准噶尔部、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等西北边疆势力间的关系，利用蒙古文《清内阁蒙古堂档》、满文《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第一手档案史料，阐明其服属清朝的过程及康熙朝前半期的西北边疆政策。

关键词 蒙古 阿拉善和硕特部 清朝 西北边疆

作者齐光，1981 年生，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讲师。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邮编 200433。

康熙十五年（1676），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打败鄂齐尔图车臣汗部，成为天山北麓卫拉特蒙古诸部的盟主。鄂齐尔图车臣汗部瓦解后，属众四处逃散，其中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罗理率领族众迁移至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甘肃省北部一带居住，后服属清朝，被称为阿拉善和硕特或阿拉善厄鲁特（Mon: alaša qoşud 或 alaša ögeled）。和罗理，是固始汗第四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第四子。鄂齐尔图车臣汗出生前，固始汗将亲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作为养子送给其兄长拜巴噶斯领养。阿拉善和硕特部作为卫拉特蒙古诸部中最早服属清朝的一支，其服属过程纷繁复杂，前后延续了将近 20 年，最终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被编立为扎萨克旗。

先行研究中，苗棣以《清前期的西套难民问题和阿拉善旗的设置》^①为题，利用《清圣祖实录》等整理了康熙十六年（1677）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间的和罗理动向，然苗氏只关注了和罗理与清朝间的关系，而没有将青海和硕特部、准噶尔部、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等对和罗理—清朝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其他西北边疆势力纳入考察范畴。梁丽霞也利用《清圣祖实录》、《皇朝藩部要略》等论述过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过程，并总结为：“清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不但直接影响着阿拉善蒙古的命运，而且也间接影响着西北地区局势的发展。”^②但因史料所限，梁氏没有具体阐明清朝为了解决和罗理问题怎样与西北边疆其他势

* 本文由笔者重新补充修缮《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清朝与西北形势》（《满族史研究》2007 年第 6 号）而成。

① 苗棣：《清前期的西套难民问题和阿拉善旗的设置》，《西北史地》1983 年第 1 期。

② 梁丽霞：《阿拉善蒙古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7 页。

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与清朝西北边疆形势

力交涉,西北边疆势力间的内部动向反过来又对和噶理的活动及清朝的态度产生过怎样影响等问题。

鉴于此,本文利用反映当时史实的蒙古文《清内阁蒙古堂档》(*Daicing gürün-ü dotuγatu yamun-u mongγul bicig-ün ger-ün dangsa*)、满文《亲征平定朔漠方略》(*Beye dailame wargi amargi babe necihiyeme toktobuha bodogon i bithe*,以下简称《朔漠方略》)等第一手史料,^①旨在当时的清朝西北边疆形势这一大框架内,带着以哪些事件为契机清朝推进了与和噶理之间的关系,其背后清朝与青海和硕特部、准噶尔部、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等又进行过怎样的交涉等问题,揭示和噶理服属清朝的详细过程及编立扎萨克旗时的阿拉善和硕特部情况。

一、卫拉特蒙古侵扰清朝西北边境事件

鄂齐尔图车臣汗部瓦解之后,和噶理及其兄弟等率领各自属民,自天山北麓迁移至当时清朝的西北边境——甘肃省北部地带,随即展开了试探性的侵扰。对此,苗棣、梁丽霞等都有所论及。现仅据满文史料,对清朝的相应政策进行简单论述。关于和噶理等侵扰边境的最初报告,靖逆将军张勇、川陕总督哈占、凉州提督孙思克等奏称:“厄鲁特济农等,为噶尔丹所败,逃至近边,违禁闯入塞内,抢夺番目及居民马匹、牲畜等。守汛官兵驱赶时,济农等言,我等皆是鄂齐尔图汗之子,因穷困无所归,故至此等语。”^②

史料中的“济农”,即指“巴图尔额尔克济农”(Mon: baāatur erke jinūng)和噶理。“沿边”,指沿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经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至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长城一线分布的布隆吉尔河、额济纳河流域及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地区(参见下图)。当时,此地因是清朝、喀尔喀蒙古三汗部、青海和硕特部及准噶尔部之间的权力真空地带,故和噶理等能够长驱直入而驻。长城南部、祁连山脉北麓,则是蒙古语谓之“šira tala”的大草滩。当时大草滩由清朝边境守备看守,想必和噶理等寻此大草滩而擅自闯入了清朝境内。“番目及居民”,则指自甘州、凉州起,经四川松藩、打箭炉地方,至云南中甸一线,沿清朝与青海和硕特部边境居住的藏人部落,^③当时彼等纳贡于青海和硕特部领主,直接或间接地受其支配。

为处理和噶理等的侵扰事件,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康熙帝特命驻留陕西的抚远大将军图海担当边境防卫。图海,乃是镇压察哈尔“布尔尼亲王之乱”时的清朝名将。^④但康熙帝颁布此令时强调“著大将军图海,酌量指授而行,勿至生事”。^⑤不久,康熙十七年(1678)四月,与和噶理同时逃来的额尔德尼和硕齐,掠夺了乌喇特部。此时,康熙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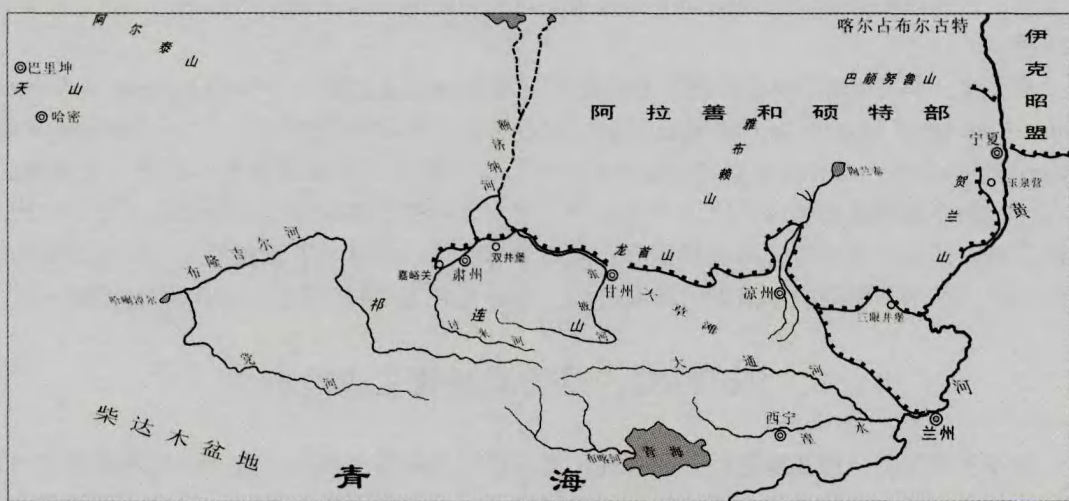
① 关于蒙古文《清内阁蒙古堂档》的介绍,参见齐光:《论康熙末年清军入藏及阿善和硕特的作用》,《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1年第4辑,第147—161页。而关于满文《朔漠方略》的价值,请参见[日]石滨裕美子:《藏传佛教世界的历史研究》,东方书店2001年版,第231—232页。

② 满文《朔漠方略》卷1,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

③ [日]佐藤长:《关于罗卜藏丹津叛乱》,《史林》1973年第55—56号。

④ 图海,八旗满洲正黄旗出身,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作为副将军镇压了察哈尔“布尔尼亲王之乱”。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作为抚远大将军被派至陕西,并于同年五月镇压了“王辅臣之乱”。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49《名臣列传·正黄旗满洲世职大臣·图海》。

⑤ 满文《朔漠方略》卷1,康熙十六年十二月辛未。



服属清朝时的阿拉善和硕特部及其周边图

说明：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9页基础上制作而成。

只命乌喇特及邻近鄂尔多斯、四子等部“挑选干练章京、披甲等驻扎卡伦，不时巡防汛地”。^① 额尔德尼和硕齐是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叔父楚琥尔乌巴什之孙罕都部将，噶尔丹袭击楚琥尔乌巴什时彼偕罕都逃至清朝西北边境，与和罗理等近距游牧。^② 此外，同年五月，和罗理等至青海，自双井（肃州东北部要塞）侵入清朝边境，被靖逆将军张勇驱逐。^③

如此，清朝面对和罗理、额尔德尼和硕齐等卫拉特蒙古的侵扰和掠夺，只采取了巡防、驱逐等措施，没有积极进行军事围剿。其理由，虽与入关初期的清朝在处理相关卫拉特、喀尔喀蒙古事务时考虑达赖喇嘛的权威而一直采取了友好的方针不无关系，但实际上这与当时的清朝国内正在发生的三藩之乱有着密切关联。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至二十年（1681）十月，正是清朝镇压国内“三藩之乱”时期。而和罗理等最初侵扰西北边境的康熙十六年（1677），清军与吴三桂军正在汉中地区进行激烈拉锯战。是年三月，康熙帝“更令图海，整饬陕西满汉官兵，进扼汉中要路”，^④ 康熙帝下达严防和罗理侵扰命令的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图海手中实无应付和罗理的剩余兵力。不久，康熙十七年（1678），清军将吴三桂军队压制至湖南岳州。关于当时的清军布阵情况，《清圣祖实录》卷73康熙十七年（1678）五月庚子条，载有詹事府詹事宜昌阿如下的上奏：“我兵进湖后，于高家庙、君山、扁山、九贵山、九马嘴诸处，联络泊舟，一断贼路。九贵山复设陆营，使水路相望。我船相去不远。纵岳州贼兵出犯，可以并力攻击。即长沙、衡州、常德诸贼来援，亦可合势剿御。贼内外阻绝，势必穷蹙。”

湖南省岳州位于洞庭湖连接长江中游流域的水运要冲。为从吴三桂手中夺取此地，清

① 满文《朔漠方略》卷1，康熙十七年四月甲午。

② 参见《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下简称《王公表传》）卷79《阿拉善厄鲁特部总传》。

③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卷1，康熙十七年五月甲子。

④ 《清圣祖实录》卷66，康熙十六年三月乙巳。

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与清朝西北边疆形势

朝投入水陆两军构筑起大规模包围阵地来进行战斗。关于此岳州战役,《朝鲜肃宗大王实录》卷7肃宗四年(1678)八月辛巳条有如下记载:“今吴三桂形势颇盛,所争方在岳州。郑锦与三桂联兵,天下事姑未可知,而三桂则以主对客,清兵不习水土,相持已久,智勇俱困,若使蒙古一起则事不可知矣。”当时,清朝中原战局的情报不断地传入朝鲜王朝的宫廷,但是因彼等一开始就对清朝的败北确信无疑,^①故而不能完全照此史料中的记载来判断当时的史实,只是关于此岳州包围战,清朝投入水陆大军进行过长期苦战的情况,想必确为属实。

如史料所载,康熙十六、十七年(1677、1678)的清朝正倾一国之力在镇压“三藩之乱”,故实际上已没有抽调军队去讨伐和噶理等卫拉特蒙古的余力。再,当时的清朝户部银库的贮藏额也已陷入危机状态,^②清朝在财政上似乎也没有前去讨伐和噶理的实力。另外,记载岳州包围战实况的《朝鲜肃宗大王实录》中“若使蒙古一起则事不可知矣”一语亦在说明:若蒙古在北方形成反清势力,则形势将变得对清朝很不利。康熙十四年(1675),清朝已平定“布尔尼亲王之乱”,史料中的蒙古绝非指察哈尔,在康熙十六、十七年,除和噶理等卫拉特蒙古的侵扰之外,清朝国内实无其他相关蒙古的重大事件。为此,《朝鲜肃宗大王实录》中的记述,虽然有些莫然,却也说明了当时的清朝西北边疆局势因和噶理等卫拉特蒙古的侵扰而变得非常紧迫的事实。

二、清朝处理侵扰事件及与西北边疆势力间的交涉

在清朝全力镇压国内三藩之乱而无暇顾及西北边疆事务之际,青海和硕特部调停人的出现,给处理和噶理等的侵扰事件带来了一线转机。当时,青海和硕特部左翼领主墨尔根台吉似与额尔德尼和硕齐有过交涉,特遣使北京向清朝送还了额尔德尼和硕齐掠去的乌喇特部巴达礼台吉之子女。此墨尔根台吉,即为固始汗第二子鄂木布长子,因康熙十三年(1674),亲率属下侵入过大草滩而与清朝有过交道,事后双方关系友好。^③康熙帝以墨尔根台吉送还乌喇特部被掠人畜为契机,特遣理藩院郎中额尔塞等至青海,要求青海和硕特部按其法律处罚额尔德尼和硕齐。此次额尔塞等带去的《康熙十八年四月二日赐达赖巴图尔台吉、墨尔根台吉之敕书》,收录在《清内阁蒙古堂档》第2册(蒙古文第90—92页)中:

去年春闰三月,乌喇特巴达礼台吉之男、妇、子、女二十人,被贼所杀。男、妇、子、女六十三人,马二千七百四十一匹,骆驼一百八十九头,大蒙古包七座,甲冑十八领,被贼所掠去。部(理藩院)照此上奏奉谕:“著交该部严查”,然至今尚未查出贼

① [日]神田信夫:《三藩之乱与朝鲜》,《骏台史学》1951年第1号。

② 据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奏文所记的康熙六年(1667)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户部银库贮藏额,可知当时的情况。康熙六年(1667)的户部银库贮藏额为2488492两,三藩之乱爆发时的康熙十二年(1673)增加至21358006两。而在三藩之乱激战时期的康熙十七年(1678)减少至3339920两,平定三藩之乱后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增至26052735两,康熙三十五年(1696)更增至42628989两。由此可知,三藩之乱时期清朝财政收入的减少与军费开支的增加情况颇为严重。参见《康熙乾户部银库历年存银数》,《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日]岸本美绪:《关于清代户部银库黄册》,《清代中国的诸问题》,山川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243页。

③ 参见《王公表传》卷84《多罗贝勒纳木扎勒列传》。

之详情。今岁墨尔根台吉遣玛希坦、巴颜太二人,将杀害巴达礼台吉后掠去之巴达礼台吉子阿穆与其妹,及一女,送至矣……今闻额尔德尼和硕齐等驻牧额济纳河,达赖巴图尔、墨尔根台吉等务必制止尔属下额尔德尼和硕齐等之偷盗,并照尔等法规严加治罪,将所掠人畜等,照数送还。

同样的内容,在满文《朔漠方略》卷1康熙十八年(1679)四月丙寅(二日)条中,亦有记载。达赖巴图尔台吉,即为固始汗第六子多尔济。据蒙古文史料《噶邦希喇布传》记载,固始汗将遗产悉数交给了达赖巴图尔台吉,然他却毫无犹豫地分配给了固始汗其他子孙,^①表明在固始汗去世后的青海和硕特部,达赖巴图尔台吉是当之无愧的首领。顺治十五年(1658),五世达赖喇嘛又赐予达赖巴图尔“达赖洪台吉”封号,更加巩固了其在青海和硕特部中的首领地位。^②康熙十八年左右,五世达赖喇嘛在给康熙帝的上书中有“吾与第巴、达赖巴图尔及以达赖巴图尔为首的众人协商”办理,^③表明当时的达赖巴图尔台吉正辅佐达赖巴图尔及五世达赖喇嘛左右着青海和硕特部与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政治。在敕书中康熙帝说额尔德尼和硕齐是达赖巴图尔台吉等的属下,表明当时的康熙帝对西北边疆势力的内部关系还缺乏足够的了解。面对康熙帝的要求,达赖巴图尔台吉等做出如下答复:“额尔德尼和硕齐及滚布等,原系噶尔丹叔父楚呼尔吴巴什属下之人。今如同群居之野兽,远徙游牧,我等不便查议。毛济喇克台吉,原来即居此地。巴图尔济农,向上主借路,来至我处。皆无劫掠吴喇忒之事。”^④如此,向康熙帝强调:额尔德尼和硕齐是受追杀的原噶尔丹属下,而非青海和硕特部之人,其又游牧在远方,故无法查办,同时又坚持和啰理等并没有掠夺乌喇特部,明确否定了和啰理的抢掠行为。其实,康熙十四年(1675),乘陕西王辅臣之乱,青海和硕特部曾掠夺过清朝的西部边境。为此事康熙帝与五世达赖喇嘛之间一直有书信来往。康熙十六年(1677),五世达赖喇嘛在给康熙帝的一封书信中言道:“今厄鲁特朝政崩溃,闻生各种逃人。地方边境于何处发生意外,亦不可知。虽是如此,已多次颁旨青海全体诺颜,明其事理。达赖巴图尔为不至于向内地施暴,一直谨慎行事。今我又颁旨矣。”^⑤在此,达赖喇嘛向康熙帝表示:虽卫拉特蒙古内部已发生动乱,但已颁旨给达赖巴图尔台吉等,要求青海和硕特部不要为此而妄动攻击清朝。显然,达赖巴图尔台吉等是接受了五世达赖喇嘛的以上这些建议,而墨尔根台吉才向清朝送还了额尔德尼和硕齐所掠去的乌喇特部人畜。只是因额尔德尼和硕齐本人直接牵涉到噶尔丹,故而达赖巴图尔台吉等采取了慎重态度,婉言拒绝了清朝方面的要求。

据《清内阁蒙古堂档》第3册(蒙古文第129—132页,满文第320—324页)《巴图尔

① 巴岱、金峰、额尔德尼整理:蒙古文《卫拉特历史文献》(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噶邦希喇布传》之《记四卫拉特领主分封遗产给子弟》条记载:“固始汗,没有将西藏之全体领主及财产分封与长子,全部交给达赖洪台吉,而达赖洪台吉则言‘吾一人怎敢独吞’,遂将其分给众亲戚。”

② 参见(清)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第巴索南热丹的超度法事。

③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2册,蒙古文第110页,《达赖喇嘛为事之奏文》。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初六日,此文由墨尔根绰尔济等,自藏文译至蒙古文。

④ 满文《朔漠方略》卷1,康熙十八年十月壬申。

⑤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册,蒙古文第465—470页,《达赖喇嘛奏文》。此奏文在蒙古堂译成满文后,于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二十四日,由大学士觉罗拉都虎等上奏康熙帝。

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与清朝西北边疆形势

额尔克济农之奏文》内称：“兄达赖洪台吉致我等之文内称：查办全部袭取之物及鄂尔多斯马匹之文书已至，思难以逃脱主之旨意。”^①说明，达赖巴图尔台吉私下里还指示和罗理，使其尽快归还从清朝所掠夺的人畜物品。为此，康熙十八年（1679）五月，和罗理通过凉州提督孙思克向康熙帝上书请安，^②以表歉意。不久，康熙帝即派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虎至游牧于肃州边外的和罗理处，搜捕了曾掠夺过乌喇特部的当事人。^③康熙二十年（1681）五月，和罗理又遣使进贡，表示谢罪，并答应归还额尔德尼和硕齐等所掠夺去的乌喇特部人畜及宁夏马匹等。^④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和罗理再次谢罪，又表示尽量赔偿额尔德尼和硕齐所掠夺去的乌喇特部马匹，并请求在宁夏进行贸易。对此康熙帝再派拉都虎，通告已原谅此次罪行，但以无前例为由拒绝了和罗理于宁夏贸易的请求。^⑤

在与青海和硕特部的交涉中得知额尔德尼和硕齐是噶尔丹旧部之后，康熙帝立即着手与噶尔丹交涉。康熙十八年（1679）十月，通过来至北京的使者向噶尔丹托付信函，要求其尽快捕获并处罚额尔德尼和硕齐等。^⑥康熙十八年（1679），噶尔丹正指挥军队在哈密、吐鲁番等天山东部地带作战。^⑦哈密、吐鲁番与额济纳河流域并不遥远，若欲攻伐，噶尔丹铁骑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噶尔丹并没有对游牧在额济纳河流域的额尔德尼和硕齐等准噶尔旧部及和罗理等旧鄂齐尔图车臣汗属部采取军事行动。其实，这与康熙十七年（1678）冬，五世达赖喇嘛赐封噶尔丹为“持教博硕克图汗”（Mon: danjin bošoātu qaāan），承认其为天山北麓全体卫拉特蒙古的盟主一事有关。宫胁纯子将康熙十七年（1678）噶尔丹曾一度进军青海和硕特部却半途而返的原由，以赐封汗相类推，认为“达赖喇嘛五世制止了其入侵青海”的行动。^⑧而作为进攻青海和硕特部的一个环节，可能噶尔丹对和罗理等也没有采取行动。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成功平定三藩之乱的康熙帝，为宣扬其战功，隆重派使臣至喀尔喀蒙古三汗部及噶尔丹处，对各部首领进行了丰厚的赏赐。其中，前往噶尔丹处的内大臣祁他特还兼有向噶尔丹要求捕获并处罚和罗理、额尔德尼和硕齐二人的使命。关于此事，《清内阁蒙古堂档》第3册（蒙古文第111—112页）《赴厄鲁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处之大臣等所奏文书》中记载如下：

康熙二十一年秋之孟（七）月初五日，内大臣祁他特、头等塔布囊鄂齐尔、头等

① 此和罗理奏文在蒙古堂译成满文后，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二十八日由大学士明珠等上奏康熙帝。

② 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2册（蒙古文第100—101页）《厄鲁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奏文》。此文在蒙古堂译成满文后，六月二十日由大学士索额图、明珠等上奏康熙帝。同样的内容在满文《朔漠方略》卷1康熙十八年五月己未条中，也引用凉州提督孙思克奏文记载。可能孙思克先将和罗理的奏文内容报告给康熙帝，而后才将和罗理奏文原件送至北京。

③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卷1，康熙十八年五月己未。

④ 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2册（满文第331—333页）《厄鲁特巴图尔济农之奏文》。此文末尾写有“五月吉日上奏”，好似和罗理此文途径3个月后才到达北京，其内容记入满文《朔漠方略》卷2康熙二十年八月乙巳。

⑤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卷2，康熙二十一年九月癸亥。

⑥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卷1，康熙十八年十月壬申。

⑦ 参见〔日〕宫胁纯子著、晓克译：《最后的游牧帝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⑧ 参见〔日〕宫胁纯子著、晓克译：《最后的游牧帝国》，第201—202页。

侍卫觉罗孙果、头等侍卫阿南达、员外郎恩格森等奏。曾奉上谕：“尔等共议额尔德尼和硕齐、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事”，而为如何商议事请旨时奉上谕：“毋庸多议，若是噶尔丹属下，约定期日，速将其收捕。若非彼之人，言‘我无法收捕’等语，则答复：‘我等自有打算’”等语。^①

从“若非彼之人，言‘我无法收捕’等语，即答‘我等自有打算’”一语即可窥探出，成功平定三藩之乱的康熙帝开始转变策略，要积极解决和噶尔丹等曾侵扰过西北边境的卫拉特蒙古集团的问题。康熙二十二年（1683）一月，祁他特等面见噶尔丹时，果然要求其尽快收捕治罪和噶尔丹、额尔德尼和硕齐。对此，噶尔丹以“和噶尔丹等乃是已献给达赖喇嘛之人”为由，向祁他特表示：与达赖喇嘛商量后，以丑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为期限，答应收捕和噶尔丹等人。^②

鄂齐尔图车臣汗部瓦解之后，为寻求五世达赖喇嘛庇护而逃至拉萨的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先五世达赖喇嘛曾许其居住龙头山”为由上书康熙帝，请求允许其在龙头山居住。^③对此，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康熙帝采纳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虎“边塞要地，似不宜让不知法度之蒙古人居住”^④的主张，没有同意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的请求。史料中的龙头山，指位于甘州府东北部的龙首山，蒙古语谓之“alay ayula”的山脉。阿拉善一名，想必即由此龙首山之蒙古称谓“阿喇克山”而来（参见图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前后，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迎娶喀尔喀蒙古左翼土谢图汗女为妻，双方结为同盟。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与土谢图汗之间的这种联姻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当时，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除杀害鄂齐尔图车臣汗之外，噶尔丹还积极插手自康熙初年起始的喀尔喀蒙古内讧，并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后，诱导右翼扎萨克图汗成衮子沙喇攻打土谢图汗。^⑤另外，此次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与土谢图汗之间的联姻，对清朝的和噶尔丹政策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得知双方联姻情报的康熙帝立即改变了此前通过噶尔丹来收捕和噶尔丹的方针。关于此，《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甲申条记载如下：

上谕学士等曰，“此事朕知其故。初厄鲁特鄂齐尔图汗为噶尔丹博硕克图所杀，其国被夺。其子衮布喇卜坦，其侄巴图尔济农败遁，求达赖喇嘛指授所居之处。达赖喇嘛令衮布喇卜坦居住阿喇克山。自此遂居彼地。先是，巴图尔济农于我定边界缘边驻牧，曾移文噶尔丹博硕克图，言‘此乃尔厄鲁特之人，若尔收取，则取之，若不收取，我自有处置’。今闻衮布喇卜坦娶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女为妻，两处互相犄角。噶尔丹博硕克图欲以兵向衮布喇卜坦、巴图尔济农，则恐喀尔喀土谢图汗蹶其后。欲以兵向喀尔喀，则恐衮布喇卜坦等蹶其后。盖断不能收取巴图尔济农者也”。

① 同样的内容在满文《朔漠方略》卷2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乙卯条中也有记载。只是满文《朔漠方略》中的记载，不仅是和噶尔丹的，也囊括了康熙帝下达给包括噶尔丹、土谢图汗在内的所有准噶尔部及喀尔喀蒙古三汗部有实力者的谕旨。

②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卷2，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戊戌。

③ 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3册（蒙古文第12—13页，满文第179—180页）《罗卜藏衮布之奏文》。此文在蒙古堂译成满文后，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七月三日由大学士明珠等上奏康熙帝。

④ 满文《朔漠方略》卷2，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乙酉。

⑤ 参见《王公表传》卷61《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总传》。

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与清朝西北边疆形势

在此,康熙帝将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说成是鄂齐尔图车臣汗之子,显然这是康熙帝的误解,如前所述,实为其孙。这表明当时的康熙帝还未详细掌握西北边疆各势力的内部情报。再,康熙帝还说:“达赖喇嘛令衮布喇卜坦居住阿喇克山。自此遂居彼地。”如前所述,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康熙帝采纳拉都虎的意见没有同意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移住龙头山的请求,在此谕旨内康熙帝却说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实际已移住彼地,且又容忍了这一现实。那么,为什么康熙帝的态度从禁止移住转变至容忍移住了呢?显然,这与康熙帝此次谕旨后一部分所提到的判断有直接关系。康熙帝设想,成为姻戚的土谢图汗部与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和罗理势力联合后形成犄角之势而能牵制噶尔丹,因此噶尔丹决不能收捕和罗理。基于这一婚姻关系,康熙帝将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和罗理势力与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喀尔喀蒙古左翼土谢图汗部并列看待,开始重视和罗理等卫拉特蒙古集团在清朝西北边疆各势力中的存在。

不久,清朝与噶尔丹之间曾经约定的收捕和罗理、额尔德尼和硕齐的丑年四月期限已过,但仍不见噶尔丹之动静。得知这一情况的康熙帝,基于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先五世达赖喇嘛曾许其居住龙头山”的奏言致书五世达赖喇嘛,要求其协助康熙帝一同给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和罗理选定游牧地。《清内阁蒙古堂档》第4册(蒙古文第317—324页)《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为言事致达赖喇嘛之文》中有如下记载:

皇帝之旨。致西方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遍知一切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约定之期限(丑年四月)已过数月。今天下太平,只此辈兄弟骨肉离散,各自散居,失其生业,朕心中大为怜悯……厄鲁特众领主,皆奉尔喇嘛,依喇嘛尔之法度,尊尔之教诲。自与朕混一佛教政治以来,诚信来贡,代代不绝。思,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乃鄂齐尔图汗之孙,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原皆为鄂齐尔图汗之亲戚兄弟。为此,合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于一地,使其居住以能够生业,以此示朕兴绝举废之至意。先鄂齐尔图汗对朕诚心尽力,对尔喇嘛亦做施主久矣。不忍坐视此辈子侄宗族穷困至极。故我等一同遣使,兴绝举废,欲使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合于一地居住。如是,方可符合喇嘛慈悲一切,朕使天下太平幸福之至意。若思朕之旨意正确,喇嘛可自彼处遣一喇嘛,与朕此次前去之人约定期日,使其返回。朕自此再遣一大臣,派至约定之地,与喇嘛之使相见而行事。

如此,康熙帝致书达赖喇嘛,强调因卫拉特蒙古诸领主皆崇奉达赖喇嘛,且鄂齐尔图车臣汗对康熙帝也曾诚心职贡,故要求达赖喇嘛合作,而给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后人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及和罗理指授游牧地。从此件康熙帝书信内容,可知当时的清朝已经充分了解了厄鲁特蒙古诸部领主敬重五世达赖喇嘛,并在其旨意下调节自身活动的现实情况。为此,康熙帝试图通过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合作,给和罗理等安排游牧地,使其驻牧安定下来。这一举措除因清朝在与青海和硕特部及噶尔丹之间的交涉中没能收捕和罗理之外,还同康熙帝利用和罗理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间的同盟关系来牵制实力急剧膨胀的噶尔丹,以此安定西北边疆的策略,有着直接的关系。

于是,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受康熙帝之命,在达赖喇嘛使者到来之前即赴和罗理处,听取了彼等所希望居住的游牧地具体位置,并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月复命。^①显而

^①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卷3,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壬子。

易见,康熙帝是要在清朝主导下给和啰理指授居所。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接到达赖喇嘛答应书信后,^①康熙帝立即派理藩院侍郎拉都虎、温达与达赖喇嘛使者担任齐齐哈尔塔拉之堪布的罗卜藏会合于龙头山,给和啰理指定了游牧地,并颁布了一些禁律。^②以下满文《朔漠方略》卷3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一月癸巳条所记载的内容,即为理藩院侍郎拉都虎的复命:

臣我等又谓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曰:“除尔所请之喀尔占布尔古忒、空郭尔俄垵、巴颜努鲁、雅布赖、噶尔拜戈壁等地方,授与汝游牧外,自宁夏所属玉泉营以西,罗萨喀喇山嘴后,至贺兰山阴一带,布尔哈苏台之口,又西宁所属倭波岭塞口以北,奴浑努鲁山后,甘州所属镇番塞口以北,沿陶兰泰、萨喇春济、雷浑希里等地,西向至厄济纳河,俱以离边六十里为界”等语。遂指授给巴图尔济农属下达尔汗噶卜楚喇嘛、波克宰桑,及提督孙思克标下游击李本善等记之。臣我等又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定义罚例。“蒙古若杀边内之民,不论几人,俱斩,其妻、子、牲畜,俱入官。偷盗民人牲畜者,为首二人绞,仍将妻、子、牲畜,入官。余者罚以三九牲畜,鞭一百。其不为盗而私入边游牧者,台吉罚以三九牲畜,宰桑等罚一九牲畜,平人鞭五十外,仍将所骑马匹尽行入官。其携带家口、牲畜入边游牧者,不论几户,俱入官。民人往边外伐木刈草,蒙古有夺其食物者,不论几人,将所乘马匹,尽行给还民人,仍鞭三十。其属下如此每犯一次,并罚济农五九牲畜”。又交代,“俟罗卜藏袞布阿拉布坦游牧来会时,将此项情节明告于彼。再,严禁额尔德尼和硕齐之偷盗”。

史料中的喀尔占布尔古忒,指今阿拉善左旗境内的喀尔占布尔古特山。巴颜努鲁是阿拉善左旗的巴彦努鲁山。雅布赖,指阿拉善右旗境内的雅布赖山。玉泉营为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的玉泉营堡。如此,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朝指授给和啰理的游牧地,大体相当于今阿拉善左、右两旗范围。只是对额济纳河以西地方,因当时还没有纳入版图而清朝无法实施管理,成为和啰理等通往青海及准噶尔的重要通道。另外,史料中的“一九”,指合大畜马2匹、牛2头加小畜羊或山羊5只。^③这种处罚方式,作为蒙古社会的法律传统,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喀尔喀、卫拉特蒙古诸部及清朝支配下的漠南蒙古诸部。另外,鄂齐尔图车臣汗又一孙噶尔丹道尔吉,于此时自青海迁徙至阿拉善地区,与和啰理会合。^④但罗卜藏袞布阿拉布坦,以族众经营田地及骆驼已有病等理由,计划推迟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再迁至康熙帝与五世达赖喇嘛所指定的阿拉善地区定居。^⑤

① 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4册(蒙古文第385—388页,满文第511—516页)《达赖喇嘛为言事而奏之文》。此文在蒙古堂译成满文后,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五日由大学士明珠等上奏康熙帝。

②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卷3,康熙二十五年七月癸巳。

③ 参见宝音乌力吉、包格校注:《蒙古—卫拉特法典》(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④ 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6册(蒙古文第32—33页,满文第208—210页)《厄鲁特噶尔丹道尔吉之奏文》。此文在蒙古堂译成满文后,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十七日由大学士明珠等上奏康熙帝。

⑤ 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6册(蒙古文第83—85页,满文第300—305页)《厄鲁特罗卜藏袞布之奏文》。此文在蒙古堂译成满文后,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二十二日由大学士明珠等上奏康熙帝。

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与清朝西北边疆形势

如此,清朝一方面制止和噶理本人再犯边,同时又与青海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噶尔丹、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等西北边疆势力直接交涉,希望以此解决和噶理等问题。首先,三藩之乱时期,以青海和硕特部墨尔根台吉的遣使为契机,康熙帝要求青海和硕特部收捕和噶理、额尔德尼和硕齐,并以其法律严加治罪。对此,青海和硕特部慎重回复和噶理没有侵扰清朝边境,额尔德尼和硕齐是噶尔丹手下而不可收捕,婉言拒绝了清朝方面的要求。在与青海和硕特部的交涉中得知额尔德尼和硕齐是噶尔丹旧属之后,康熙帝又开始与噶尔丹交涉。时三藩之乱即已结束,康熙帝集中精力要积极解决和噶理问题,但噶尔丹却没有在与清朝约定的期间内收捕和噶理。恰好此时,与和噶理同属旧鄂齐尔图车臣汗部的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联姻喀尔喀蒙古左翼土谢图汗部。基于这一情况,康熙帝意识到与土谢图汗部形成犄角之势的和噶理是能够牵制噶尔丹的一大势力,故而迅速转变策略,从收捕转换成试图保全和噶理部。为此,康熙帝立即谋求与五世达赖喇嘛合作,将和噶理部安插在了清朝、准噶尔部、喀尔喀蒙古三汗部、青海和硕特部4者之间的战略要冲——阿拉善地方。其背景,显然是康熙帝要利用和噶理与土谢图汗部之间的婚姻关系来牵制实力急剧膨胀的噶尔丹,以求安定清朝的西北边疆。

三、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清朝与扎萨克旗的编立

康熙二十五年(1686),于扎萨克图汗领地召开的枯冷白齐尔会盟上,在清使者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与五世达赖喇嘛使者噶勒丹锡热图等的调停下,喀尔喀蒙古左右翼领主就围绕返还属民问题进行了协商,但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以失败而告终。康熙二十六年(1687),右翼新扎萨克图汗沙喇为求得噶尔丹援助而逃往准噶尔部,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立即派兵追击,并与前来支援沙喇的准噶尔军队发生冲突,战斗中噶尔丹胞弟多尔济扎布被杀,为此噶尔丹立誓要报复土谢图汗。

基于两者间的同盟关系,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月,和噶理为支援土谢图汗请求康熙帝准许其从清朝境内通过。但至少在表面上,与五世达赖喇嘛合作试图和平解决问题的康熙帝召开内阁、理藩院、兵部大臣会议,驳回了和噶理的请求。^①然而和噶理还是亲自率兵前去喀尔喀蒙古之地,参加了抗击噶尔丹的战斗。^②此外,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则中止其迁居阿拉善之地的行动,直接北上阿尔泰山掠夺了噶尔丹属部,其后前往喀尔喀蒙古支援了土谢图汗。^③还有,与和噶理同在阿拉善之地游牧的罕都等,也参加了针对噶尔丹的战斗。^④

①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卷4,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己巳。

② 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8册(蒙古文第295—298页,满文第293—295页)《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致哲布尊丹巴库图克图之文》。此文与康熙二十八年(1689)六月初三日哲布尊丹巴库图克图所奏的另一篇文书一起,由理藩院送至内阁,并在蒙古堂译成满文后,于四日由大学士伊桑阿等上奏康熙帝。

③ (清)拉德那博哈得拉著、西·诺尔布校注:《札雅班第达传》(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记载:“罗卜藏衮布,吞并额林哈毕尔噶之人归来,经古尔班诺穆,前去与赛音汗(土谢图汗)会师。”又据西·诺尔布氏考证,额林哈毕尔噶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林哈毕尔噶山一带,而古尔班诺穆则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吾县境内。

④ 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9册(蒙古文第425—429页,满文第422—425页)《厄鲁特巴图尔济农之奏文》。此文收录康熙三十年(1691)档册,具体日期不详。

如此,康熙帝曾企图利用和噶理部与土谢图汗部之间的婚姻关系来牵制噶尔丹,却出乎康熙帝的意料,和噶理、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等直接支援土谢图汗,一同抗击噶尔丹,但皆以失败而告终。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亲率3万大军,越过杭爱山脉长驱直入,屡败土谢图汗、车臣汗军队,使喀尔喀蒙古数十万民众被迫逃入漠南蒙古诸部,以寻求康熙帝的保护。

在此背景下,清朝也相应改变了对和噶理的政策。康熙二十八年(1689),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作为康熙帝使者前赴噶尔丹处时,康熙帝令阿喇尼应向噶尔丹强调和噶理等卫拉特人并没有服属清朝的事实。其内容,在满文《朔漠方略》卷5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己卯条中记载如下:

理藩院以遣使厄鲁特之大臣、官员、喇嘛等上请。谕曰,“此事关系重大,著尚书阿喇尼、散秩大臣乌巴什、归化城扎萨克大喇嘛阿奇图绰尔济、一等侍卫阿南达等前往”。阿喇尼等入内请训旨。奉上谕,“噶尔丹必问及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事,此事最为紧要。尔等但述丑年四月之约,并言前达赖喇嘛虽遣齐齐克塔拉之堪布至青海之地与我使者定议,令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同居一处,然至今尚未同居。且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虽在我地住居,但并未按服属之礼编立旗、佐领”。

从康熙帝“噶尔丹必问及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事,此事最为紧要”即可知,在当时的清朝西北边疆局势中和噶理部所占据的重要性。时噶尔丹已经占领了整个喀尔喀蒙古,雄踞清朝北疆,在这种紧迫时刻,如果清朝不向噶尔丹明言和噶理等并没有服属清朝的事实,那么噶尔丹就有可能要求康熙帝引渡曾经实际支援过土谢图汗的和噶理等人,如果康熙帝拒绝引渡,就有噶尔丹率兵入侵清朝的危险。为此,优先考虑清朝边境安全的康熙帝,为尽量避免与噶尔丹的直接冲突,指示阿喇尼向噶尔丹明言和噶理等没有服属清朝的事实。

但事态并没有按照康熙帝的预测去发展。康熙二十九年(1690),为要求康熙帝引渡逃入漠南蒙古的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库图克图,噶尔丹亲率军队入侵了早已成清朝藩属的漠南蒙古诸部,并与清军大战于乌兰布通地方。战后噶尔丹虽返回其科布多驻地,但也屡屡传出噶尔丹军队正准备要袭击清朝北部边境的风声。

康熙三十年(1691)正月,闻讯噶尔丹正进军青海的情报后,^①康熙帝立即命令清朝大臣、官员等将和噶理等迁移至长城近边游牧,^②以防止噶尔丹之偷袭。随后又指示西安将军尼雅汉,令其前去将和噶理收捕送至归化城,并将其族众迁移至内扎萨克蒙古地方居住。^③

闻此情报,和噶理唯恐清朝要收编其部,遂率族众向西逃窜。西安将军尼雅汉追击至库克布里都(今阿拉善左旗中部绿洲地带),却无功而返。康熙帝严厉处罚尼雅汉,将其革职并绞监候。^④最终,因严寒、饥饿及牲畜大量死亡,和噶理与其兄弟等率领属民被迫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月归顺了清朝。针对桀骜不驯的和噶理部,为防止其再度逃遁,康熙

①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卷9,康熙三十年正月壬子。

②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卷9,康熙三十年二月丁卯。

③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52,康熙三十年六月乙卯。

④ 参见满文《朔漠方略》卷11,康熙三十年七月甲申。

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与清朝西北边疆形势

帝命和罗理与其子一同来京觐见。和罗理领其次子玉木楚木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月来京谒见了康熙帝。^①此后，和罗理等再也没有叛离过清朝。

试图利用噶尔丹及青海和硕特部来牵制清朝的达赖喇嘛地方政权摄政桑杰嘉措，假借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请求康熙帝将和罗理等安置于青海，以使其与亲族青海和硕特部能相聚一处游牧。^②对此，康熙帝所做出的判断在《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0册（蒙古文第118—122页，满文第114—118页）《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二日为言事致达赖喇嘛之敕书》^③中记载如下：

再，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先曾穷困至极，寻朕而来，时朕倍加仁慈，为使其得以生计，驻牧阿拉善之地矣。然〔彼〕却背弃朕仁慈养育之恩，妄自揣测而逃，颠沛各地，今又穷极来归。朕仍不计前嫌，指授游牧地，使其居住。为此朕毫无得以利益，驱使彼之力量之意。现喇嘛尔言：“若使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移住青海，则能止息偷盗，可管教其严从法禁”等语。喇嘛尔出人与力，尽快使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人皆移往青海而居。如前所述，当时以青海和硕特部为首的卫拉特蒙古诸部，皆推崇达赖喇嘛权威，清朝也逐渐了解到达赖喇嘛的这种影响力。上揭史料，虽然没有直接明示康熙帝让步于达赖喇嘛的理由，但从康熙帝答应达赖喇嘛，将消耗巨大军力、财力才使其归顺的和罗理无条件地移住青海的行为中，即可知当时的康熙帝把通过得到达赖喇嘛的合作来安定西北边疆的策略，视为其西北边疆政策的重中之重。至少在完全消灭雄踞北方的噶尔丹之前，康熙帝不得不让步于达赖喇嘛。针对康熙帝的敕书内容，康熙三十三年（1694），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宣称：“为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族众，依照所奏，降下使其聚集一处居住之谕旨，其恩惠实乃大矣。”^④

在噶尔丹势力尚在的情况下，康熙三十三年（1694）九月，和罗理亲自请求康熙帝希望编立扎萨克旗。关于此事，满文《朔漠方略》卷14康熙三十三年（1694）九月乙酉条记载如下：

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奏言：“……吾铭记圣主珍奇隆恩已久。比吾后来之人，其饿腹亦满，已无忧虑。愿照例四十九旗，分编旗、佐领而生……愿往指授之地，编为参领、佐领，亲率子、弟、族众，不惜性命，捐躯效力”……“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所奏极是，甚为可怜。但达赖喇嘛奏请安插于彼所属青海地方，姑允其说。今达赖喇嘛使者将至，俟使者至日，彼又云何，斯时当另下谕旨”。

如此，不管和罗理为申请编立旗、佐领而如何上奏，康熙帝仍在优先考虑达赖喇嘛地方政权方面的态度。在达赖喇嘛使者到来之前，尽量搁置了编立和罗理为扎萨克旗的事务。利用达赖喇嘛的权威来安定西北边疆的策略，此时仍然是康熙帝所坚持的第一方针。

①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三月乙丑。

② 参见《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0册（蒙古文第28—32页，满文第23—27页）《达赖喇嘛为言事而奏之文》。此文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正月二十七日由理藩院送至内阁，并在蒙古堂译成满文后，二月二日由大学士伊桑阿等上奏康熙帝。

③ 本敕书在内阁做成并得到康熙帝允诺之后，于五月十四日从北京发出。同样的内容在满文《朔漠方略》卷13康熙三十二年（1693）二月己丑条中亦有。

④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2册（蒙古文第380—385页，满文第374—378页）《达赖喇嘛为言事而奏之文》。此文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十一月十七日由理藩院送至内阁并在蒙古堂译成满文后，十八日由大学士伊桑阿等上奏康熙帝。

围绕和噶尔的迁居问题,清朝与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积极交涉期间,于喀尔喀蒙古之地情况发生了重大转折。康熙三十四年(1695)秋,噶尔丹离开科布多大本营,亲率其军队直接向东越过肯特山脉,移至克鲁伦河上游驻牧。得知此一情报,认为噶尔丹大致已经进入可攻击范围的康熙帝,组织由东、中、西3路组成的讨伐大军,自身则亲率中路军前往。康熙三十五年(1696)五月,清朝西路军与噶尔丹军队在喀尔喀蒙古图拉河畔进行了一场决定噶尔丹生死命运的大决战,即著名的“昭莫多战役”。在此战役中,噶尔丹受到清朝西路军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次战役中,和噶尔次子玉木楚木作为西路军向导前去参战。《王公表传》卷80《扎萨克多罗贝勒和噶尔列传附辅国公玉木楚木列传》记载:“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西路大将军费扬古以阿拉善兵为前驱,玉木楚木侦噶尔丹自克鲁伦窜特勒尔济,偕副都统阿南达驰迎之。费扬古统兵继进,噶尔丹败遁。”如此,和噶尔次子玉木楚木率领所部兵丁,作为西路大将军费扬古的前头部队侦查并直接攻击噶尔丹军队,为清军的最终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察知噶尔丹军队已进入可攻击范围的康熙帝立即将曾考虑达赖喇嘛意见而保留编立扎萨克旗的和噶尔兵丁,与清朝的八旗、内扎萨克蒙古、喀尔喀蒙古兵一同动员起来,并将其部署在对噶尔丹攻击部队的最前方。清朝将和噶尔兵丁安排在如此重要位置的理由,除噶尔丹曾是杀害和噶尔叔父鄂齐尔图车臣汗、袭击其姻戚土谢图汗的仇敌之外,还与和噶尔兵丁作为旧鄂齐尔图车臣汗属下,与噶尔丹军多次交锋,深知其运动特点而比清军其他部队更能捕捉其动向有直接关联。此外,康熙帝也可能以此试图探测桀骜不驯、叛服无常的和噶尔兵丁的忠诚心。即使在昭莫多战役之后,和噶尔属下兵丁也发挥过其他人无法发挥的重要作用。据满文《朔漠方略》卷27康熙三十五年(1696)七月甲子条记载:

理藩院等衙门奏言。“曾奉上的谕,‘噶尔丹为我大兵所败,今已无所往。阿南达现在图喇,应令率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兵,驻扎厄济内、古喇奈、昆都伦、布隆吉尔等处地方,侦探声息。内大臣索额图、大学士阿兰泰,汝等可与议政大臣会议来奏’,此实属恰当。议曰,‘谕旨允当。今噶尔丹为我大兵所败,已无所往。请檄阿南达,速率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兵,驻扎厄济内、古喇奈、昆都伦、布隆吉尔等处,侦探声息。如得噶尔丹音讯,即相机堵御,擒而诛之’。上从之。”

昭莫多战役之后,康熙帝命滞留图拉河流域的一等侍卫兼副都统阿南达率领和噶尔属下兵丁,赴阿拉善地方以西之额济纳、布隆吉尔河流域驻扎,试图以此阻止噶尔丹为寻达赖喇嘛庇护而逃往西藏。这也是将昭莫多战役之后最为重要的捕获噶尔丹的任务,交给了和噶尔属下兵丁。这可能与和噶尔属下兵丁经常来往于额济纳等地而熟知其地理条件直接有关。

昭莫多战役结束后的次年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九月,康熙帝不等达赖喇嘛使者的到来,一举将驻牧于阿拉善地方的和噶尔族众编立为“旗一佐领”。《清圣祖实录》卷185康熙三十六年(1697)九月丁未条记载:“理藩院题,请将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所有壮丁编为佐领,另为一扎萨克,铸给印信,明年令移至乌喇忒附近之地居住。上曰,若将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移住近地,则沿边别部蒙古甚多,岂可尽移乎。蒙古事,在治之得其道,不在地之远近。著停其迁移,其编佐领为扎萨克给印信,俱依议。”所谓的扎萨克旗,即指清朝模仿八旗,于服属后的外藩蒙古诸部施行的一种军事制度,按照“和硕(旗)一扎兰(参领)一苏木(佐领)”统属关系来进行管理。康熙三十六年(1697),阿拉善和硕特部的编制为:1旗,2扎兰,7佐领,1050名箭丁。此外,清朝还从蒙古社会的领主层中选

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与清朝西北边疆形势

定出身高贵且与清朝亲密的有力者，任命为旗的执政——扎萨克。《清圣祖实录》卷185康熙三十六年十月丁巳条记载：“理藩院题，厄鲁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应授何职，于何处住牧。得旨，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授以贝勒，另为一扎萨克给与印信，约其属下人丁，分编佐领，住贺兰山。”史料中的贺兰山，即指位于今阿拉善左旗东部南北走向的贺兰山脉。此段史料的意思即编立佐领之后，作为外藩蒙古王公，清朝授予和啰理贝勒封号，让其担任扎萨克，并决定仍驻牧原阿拉善之地。至此，阿拉善和硕特部被编成扎萨克旗，正式服属了清朝。

那么，为何至康熙三十六年九月，清朝才将阿拉善和硕特部编成扎萨克旗的呢？首先，康熙三十五年（1696）五月，于昭莫多战役中噶尔丹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月，噶尔丹即死去。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受康熙帝所派使臣的招抚，青海和硕特部表示友好。以上两种结果，即使是暂时的，也宣告为谋求安定准噶尔部、青海和硕特部两大势力，康熙帝不得不牺牲阿拉善和硕特部，以换取达赖喇嘛合作之被动局面的结束。还有，康熙三十六年三月，被隐瞒多年的五世达赖喇嘛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即已圆寂的消息，由达赖喇嘛地方政权摄政桑杰嘉措报告给了康熙帝。因此，通过得到达赖喇嘛合作来安定西北边疆的方针，至此连其前提都已消失了。在这种大背景下，康熙帝立即着手将阿拉善和硕特部编为扎萨克旗。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编和啰理族众为扎萨克旗，是康熙帝与和啰理两人的共同意愿。如前所述，一方面当时的和啰理希望清朝将自己的族众编成佐领；另一方面康熙帝也为了预备将来的军事行动，有必要将与西北边疆诸势力持有广泛关系的和啰理属下编成清朝的兵丁。满文《朔漠方略》卷14康熙三十三年（1694）九月乙酉条中和啰理的奏言“愿往指授之地，编为参领、佐领，亲率子、弟、族众，不惜性命，捐躯效力”，是一条重要线索。和啰理部众将驻牧指定地域编成参领、佐领，即被编成扎萨克旗一事，与率领其族众不惜性命诚恳效力的事情，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对此，康熙帝也认为“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所奏极是”，即清朝就是要通过编立阿拉善和硕特部为扎萨克旗，从其抽调必要的、稳定的兵力。

关于清朝与其支配下蒙古诸部间的关系，康熙帝解释为：“册封，指赐封封号。俸禄，则有益于生计。旗、佐领，则为了国家之法规。彼等（外藩蒙古王公），各自驻牧原地，仍照旧习俗安逸过活。并无废除其旧有之制度、封号，分离其家奴、属民。”^①于此，康熙帝首先强调，服属清朝的蒙古领主依然按照其原来的传统支配其属民，依然持有原来的封号，依然按照原来的习俗进行社会活动。其次，对“旗—佐领”的编制问题，康熙帝表示：这是为了使其遵守清朝法律而实施的一种措施。遵照康熙帝这种认识，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朝于阿拉善和硕特部编立扎萨克旗之际，显然也颁布了约束扎萨克及其治下箭丁的“蒙古律例”。

最后，关于编立扎萨克旗时什么样的人物被任命为“旗—佐领”官员的问题，笔者一直没有见到相关的明记史料。康熙三十五年（1696）九月，清朝副都统阿南达在设防噶尔丹南逃的奏报中言道：“于布隆吉尔之巴尔库儿、塔儿纳亲等路，其地名博罗川济，则遣蓝

^①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19册（蒙古文第450—456页，满文第443—447页）《谕厄鲁特策旺阿喇布坦之敕书》。此敕书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一月十三日，乾清门侍卫拉锡接到康熙帝的修改原稿后委托蒙古堂，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作成。

翎布达,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布儿噶齐达尔汉寨桑、马赖额尔克哈什哈率十人驻扎。于额布格特、阿木格特地方,则遣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祁劳墨尔根萨里呼纳亲率十人驻扎。”^①可知,在和罗理属下人中,那些持有旧时封号、拥有旧时官职的实力派人物,在管理阿拉善和硕特部兵丁。据此,康熙三十六年(1697)编立扎萨克旗时,有很大可能就是这些持旧时封号的人物被任命为扎兰章京、苏木章京等“旗一佐领”官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阿拉善和硕特部服属清朝,与康熙朝前半期的清朝西北边疆各势力的消长,尤其是达赖喇嘛在喀尔喀、卫拉特蒙古社会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若五世达赖喇嘛不颁布旨令,想必青海和硕特部也不会对清朝采取友好态度而遣送额尔德尼和硕齐所掠去的乌喇特部人畜,和罗理本人也可能不会向康熙帝谢罪。若不尊重达赖喇嘛不许进攻青海和硕特部的旨意,噶尔丹也有可能不会漠视清朝的要求而不收捕和罗理等旧敌,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也不会要求迁居阿拉善地方,康熙帝也不会等到完全击败了噶尔丹等势力之后才编立阿拉善和硕特部为扎萨克旗。因此可以说达赖喇嘛在蒙古社会中的权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阿拉善和硕特部服属清朝的过程。

第二,清朝针对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方针政策,从一开始利用青海和硕特部、噶尔丹、达赖喇嘛地方政权来遏制和罗理势力,转变成基于和罗理势力与喀尔喀蒙古左翼土谢图汗间的婚姻关系来牵制噶尔丹。只是,利用诸势力间的关系尽量不浪费清朝国力,以此试图安定西北边疆的方针是一贯的。三藩之乱期间,国力不够强大的清朝理所当然地要尽量避免靠直接军事打击来求得西北边疆的安定。但即使在三藩之乱结束后,清朝财政已好转的情况下,也因过度依赖西北边疆诸势力间的内部关系而没能彻底改变这种方针。于是,清朝与噶尔丹关系日趋紧迫时,为尽量回避与噶尔丹间的军事冲突以求西北边疆安定的康熙帝,明确指示向噶尔丹明言和罗理等并没有服属清朝的事实。最后,在对噶尔丹战争取得胜利,五世达赖喇嘛早已圆寂的消息也被发觉,青海和硕特部采取友好态度的前提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才一举将阿拉善和硕特部编立成扎萨克旗,使其正式服属了清朝。

第三,对于康熙三十六年被编立扎萨克旗时的阿拉善和硕特部,已成为清朝外藩王公的和罗理等领主层的属民,依旧维持了传统的“领主(王公)—属民”(Mon: ejen—qariyatu或 noyan—albatu)关系,同时,也成为作为蒙著、晓克译古可汗—清朝皇帝直接尽其军事义务的箭丁,在日常训练及出征场合不得不遵循清朝指定的“蒙古律例”而行。再,编立扎萨克旗时,和罗理属下中持旧时封号的有实力者被任命为“旗一佐领”官职。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① 满文《朔漠方略》卷29,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乙丑。